

三是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为群体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尽管穆巴拉克当局一度关闭互联网,停止短信发送,但运动的初始阶段,的确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串联的。可以说,美国发明的技术为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提供了技术保障。

四是民怨沸腾是基本动力。贪污腐化、特权阶层垄断高利润经济部门、家族专制和其他社会不公现象,是中东政治动荡的基本动力。加之高失业率和低度社会保障使得底层民众和无业知识青年忍无可忍,一有机会便揭竿而起。所以,避免政局动荡的

根本手段不是压制,而是尽量消除社会不公。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是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抑或是卡扎菲,他们在执政的早期,大体是廉洁奉公的。一旦其子女成人,形成“绿二代”,特权家族和特权阶层就控制所有高利润经济部门,社会不公就会加剧,民怨的积累也会加剧。无论第一代的口号叫得多响,民心的丧失已不可避免。对这个规律,需要有清醒认识。埃及和利比亚的教训,也需要认真汲取。○

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及其主要国际涵义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11年伊始,突尼斯首都突然爆发大众造反,导致铁腕执政 23年的总统本·阿里逃离该国。仅约半个月后,因为地理、历史和战略等缘由可称阿拉伯世界首要国家的埃及亦急剧爆发首都等大城市的民众造反。加上北非、中东其他多个国家迸发的类似连锁乱局,大半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的政治关注立即压倒性地集中于北非、中东。至今,尽管埃及 30 年来的全权统治者穆巴拉克迅速倒台,但这场跨国风暴远未平息,而且在某些国家愈演愈烈,同时阿拉伯世界中近期前景扑朔迷离,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在未定之天。

然而,有一项相当根本的论断已经可以做出,那就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观察家先前对北非、中东基本政治和社会局势的理解,有着严重的缺失和扭曲。因为特别在埃及和一定程度上在突尼斯,规模巨大、能量强劲的“第三力量”惊人地急剧迸发,而在中东、北非的大风暴大乱局之中,埃及和突尼斯的剧变分别因其影响之大和触媒性质至今仍是最重要的。这里的关键词在于“第三力量”和“惊人”:所谓“第三力量”,就是在“9·11事件”往后近 10年里流行全球的那个范式(或曰美国塑造、坚信和推广的阿拉伯世界当代根本形势解释范式)——“美国支持的专制政权 vs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

势力”——之中见不到的、以世俗性愤懑为其造反潜能的城市大众;之所以“惊人”,是因为几乎全世界都用美国的这个范式看待阿拉伯世界,因而对于现在所见的北非、中东风暴和乱局缺乏起码的思想准备和深刻的理解能力。一句话,世界对风暴爆发之前和之后的北非、中东急需一种与上述美国范式颇为不同的理解。

就埃及事态以及突尼斯事态而言,其大众造反力量大致由处于极端专制政权之下的几乎所有城市“弱势群体”构成,从学生、专业人士、失业青年一直到富裕的中产阶级,用《纽约时报》的话说,其广泛性“震惊了甚至对穆巴拉克先生的政府最持批评的那些人”,而“埃及最有力的反对派运动穆斯林兄弟会大致驻足于背景之中”。从大局而非某些细节来说,他们在投身造反时基本上没有组织、没有领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纲领,唯有一条,即可恨的穆巴拉克必须立即下台。除了这一共同目的或诉求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具有吸引力和象征性的共同汇聚地点即开罗解放广场,那在西方舆论聚光灯式的关注和有力襄助下,在大造反的 18天里每天都吸引成千上万人前往和留驻。

埃及以及突尼斯(也许还有其他某一些北非、中东国家)的大众造反有其最基本原因和形势性原

因。最基本原因无疑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对普通民众来说经久持续的非常糟糕的经济形势,尤其是非常高的城市青年失业率;与此相关,政权的财政能力大多仅仅依赖大量美国援助的不息涌入,它们对社会的巨大需要而言仍非常有限,何况不甚相关。在政治方面,不仅有对民众基本自由的非常严苛的专制压制和镇压,连同最高领导人往往任意妄为的个人独裁和警察系统被授权的恣意横行,还有在美国的充分支持下,此类统治以反恐名义获得了新的“合法性”而变本加厉;与此同时,穆巴拉克家族、其政权和国家机器各层面的腐败非常严重,而这种腐败的持续和加剧主要由于极端专制统治、美国援助和某些传统文化因素。

就形势性原因来说,在有着某种“泛阿拉伯”文化背景的“泛阿拉伯”效应作用下,那里一国民众造反成功的示范效应大概头等重要。突尼斯剧变的跨国重要性几乎仅在于此,而埃及剧变之后阿拉伯世界的广泛乱局势所难免。不仅如此,除了前述的具有吸引力和象征性的共同汇聚地点的作用外,广泛报道的、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当代电子工具的“电子动员”至关重要,对造反的广泛迅速发动和互相激荡不无某种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媒体超强聚光灯式的集中报道和西方舆论类似的集中关注——全都是同情、支持甚或加油性质的——大大激励了造反者(特别是在开罗的),并且助长了造反者的胆量和信心。

在形势性原因中,美国奥巴马政府以及欧盟主要国家政府的基本政策倾向和主要政策决定非常重要。从开罗民众造反爆发到穆巴拉克倒台的近三周里,被北非、中东政局剧变骤然推入严重战略两难的奥巴马政府大概度过了它至今最犯难、内争最甚、最犹豫多变和最带赌博性的决策过程。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奥巴马本人的作用,美国政策的基本取向越来越趋于明确,那就是试图在埃及政治剧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冒风险去较“积极地”加以适应或呼应,以便尽可能操控“应变求稳”或“经变求稳”这一对美国利益来说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以赢取潜在地反美但同时也潜在地亲美的埃及抗议民众——经他最后断定穆巴拉克不立即下台就不会被“安

抚”的造反者。到其下台前夕关于埃及危机的美国政策最后敲定,它具有超过埃及一国和美埃关系的广泛意义和重大影响,因为尽管美国政府大致仍会具体对待具体情况,但它关于北非、中东类似危机的总政策方向已经确定,不出大意外就不大会变,那就是依靠有限的附和或通融去争取制约,以企求美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不会随美国战略盟友的垮台而遭受致命的损害。

阿拉伯世界的风暴远未缓息,那里的前景扑朔迷离,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当前那里的大乱局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非常重要和颇为深远的国际影响。阿拉伯世界从大处说,很可能永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在利比亚大流血剧变和伊朗反对派顺势闹事以前,“埃及的事态……已经横贯也门、约旦、叙利亚甚而沙特阿拉伯,提供了一个新模板,提供给一个长期来因它自身的停滞感而摇晃蹒跚的地区。”

在阿拉伯世界以外,受到最大震动和冲击的是美国,或者准确地说是美国的战略及外交。它必然更深深地卷入动乱震荡的北非、中东,陷入一种比先前复杂得多的局势和严重得多的两难境地,包括“在阿拉伯青年人民渴望与冷静的战略和商业利益之间搞平衡”。美国真正地是在少有经验和准备的情况下,手上骤然多出大把麻烦,全无可能丢弃它们或简单地“快刀斩乱麻”。在这个意义上,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对美国来说大概有如一场新的“9·11”,而且可能不比“9·11”容易对付。在其突然冲击下,美国在北非、中东的战略布棋不仅已多有紊乱,而且整个战略棋盘有可能倾覆,特别包括关于也门、海湾国家甚或沙特阿拉伯、远至巴基斯坦,那都是美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和遏制伊朗方面至关重要的战略支柱。不仅如此,还可预料的是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往往难办和富含风险的歧异行将加大。总之,北非、中东政局剧变能够打乱美对外政策议程。

这些属于主要是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在近期和中期的对美祸难效应。然而,就目前较可预计或预感的另一些趋向说,它对美国乃至西方有若干重要甚而重大的有利效应。众所周知,阿拉伯世界某几个“政权变更”——目前而言主要是在利比亚或许行将实现的和在伊朗被西方盼望可能的——可以令

华盛顿高兴(而且它已经在着力推进)。不过,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只需点到为止。需要提示的是,美国似乎可以从事一项重大的战略转换,这已为美国某些战略观察家视为对美国的一项福音。那就是:与过去 10年相比,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而言,北非、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和“基地”组织恐怖主义正在急剧地减弱,如《纽约时报》2月 28日头版文章所言:“一个接一个(阿拉伯)国家民众已起来推倒领导人,而‘基地’绝对未起任何作用……那么突然地出现,又证明那么有力的斑驳杂乱的各反对派运动回避了‘基地’的两项中心信条:暴力谋杀和宗教狂热。”或者用该文的题目说,“随政权在阿拉伯世界倒台,‘基地’组织眼巴巴望见历史从旁边飞过”。因此,反恐颇有可能会干脆失去在美国对外安全政策和行动体系中已经有所缩减的头号优先地位,除了今后一段时间内在阿富汗的“卷铺盖”事业。它行将以一种尚未发现的方式,被并入美国对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更为复杂的混合政策。

还有,在外交、宣传、援助和秘密活动等政策领域,北非、中东政局剧变有可能促使奥巴马政府重回“布什纲领”,在国外(特别是北非、中东)力促“民

主”,不过没有“布什战争”。现在不仅众多共和党人、而且一些民主党人开始嚷嚷阿拉伯世界的急剧震荡证明布什在这方面方向正确,只是做法有误。奥巴马先生过去批评布什的“中东民主化”,但他“在最后两个礼拜拥抱埃及的抗议者——即使有时小心谨慎并被来自政府内其他人的相反迹象搞得混淆不清——似乎提示了一个转折点”。正是为此,布什的铁杆支持者、新保守派头号政论家罗伯特·卡根对奥巴马处置埃及危机的政策大加称赞。

在很大意义上可能更重要的,是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已开始并可能继续以一种较深刻的方式,部分地恢复西方特别是美国受到金融危机和初始复苏不振的打击之后的自信,即对其基本价值观与其“普遍适用性”的自信,连同对它们的未来历史命运的自信。心理急需之际,经过必然的过度解读,许多西方人开始感到甚或急忙宣告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在他们看来的一大涵义,即尽管有基本体制与西方大异的中国的强劲崛起和显赫成功,历史潮流仍在他们一边。这一趋向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可能广泛深刻的心理作用、意识形态影响和政策效应,需要我们予以历史性的重视。○

全球政治视野下的中东变局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2010年 12月突尼斯一座小城市的街头小贩与城管发生冲突,引起民众运动,并迅速蔓延到埃及、也门、巴林、利比亚等北非、西亚国家。一系列动荡叠加起来构成国际政治的重大事变,极大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局,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主要根源在于发生动荡的国家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长期累积,抗议民众在对统治者失去信心之后,提出了改变现状的政治要求。结论令人信服,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出,仅仅把动荡根源归结为上述因素还是显得过于简单和直接。中东是对当今世界政治演变反应最敏感的地区,在

全球政治整体性明显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中东局势的发展绝非可以自成一体。

从全球政治的系统角度理解中东事变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事变中,民众运动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乃至政治思潮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很少有哪种力量或思潮仅仅受单纯国内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其中大多与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比如,中东一些国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既由国内政策造成,也是国际资本扩张和渗透的必然结果。至于这次动乱在相关国家的蔓延扩散,本身就是国际行为,而对先进民众动员工具的运用则是全